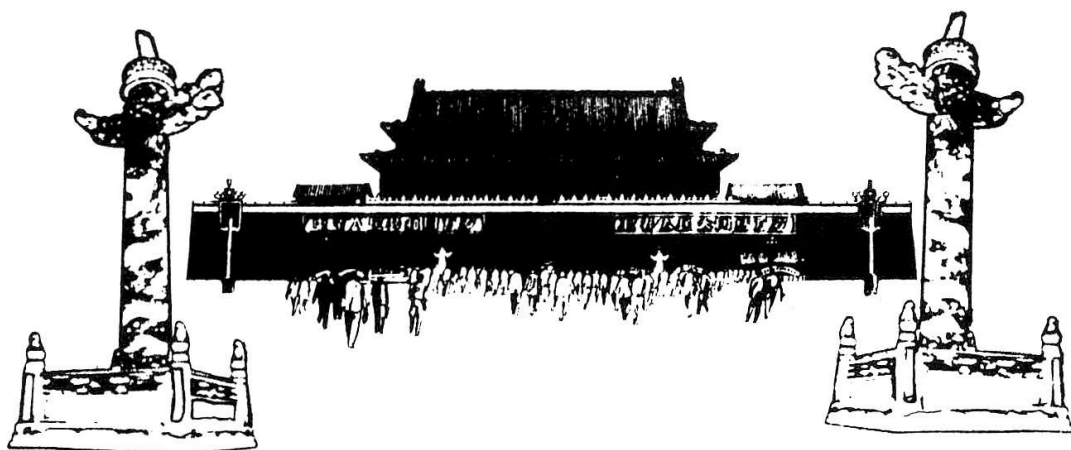


---

# 中國天主教：同一教會的兩種見証

---

古理明著  
邱倩文譯



整部中國大陸近代史，可說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所不停發生的一系列辯証式演變。

## 同一教會、兩種見証

中國過去三十五年的革命歷史，大概可以分為三大階段：(1)由「愛國會」的建立至文化大革命（一九五六——一九六六年）；(2)文革期間（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3)毛澤東逝世迄今（一九七六——一九八六年）。在這三個階段之中，愛國會的組織和功能都產生了一些改變，而大陸的教會團體對愛國會的態度和抉擇，亦有所改變。無論如何，在這三個階段之中，愛國會沒有視自己為「教會」，反之，却聲稱自己是天主教

會內的一個組織，與中國天主教會是不同的兩回事。（註一）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建立，以及它獨立自辦教會的政策，並非真正源自教會內自發的運動，從一開始就是由共產黨和政府所強加於教會身上而形成。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的「統戰」方法，藉此而羅致所有共產黨員以外的愛國者去支持國家所推行的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以及反對國際性霸權主義。

據我們所知，在中國天主教會內，除了由於極端的愛國情緒而引起的事件以外，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宣揚異端和鼓動裂教的神

學運動。事實上，我覺得中國天主教會目前的情況，並不可以與英國聖公會和法國加利岡主義的興起相提並論。英國和法國當時都是天主教國家，而中國的天主教會，在中國億萬人口之中，僅是極小的一群；統治這龐大民族的政權，不但是無神主義和獨裁者，而且視羅馬教會（梵蒂岡和教廷）為政治性組織，與反共產主義的勢力勾結，並與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為伍。

在共產黨政府統戰部的壓力下，中國天主教徒被迫對新中國的統戰政策作出個人的抉擇，但這樣的抉擇並不容易。統戰政策的主要口號就是「愛國」，統戰部認為它的政策是為達致國家最大的益處，又認為信奉天主教的公民是叛國，致使中國天主教徒受到很大的壓力。同時，統戰部又強迫天主教徒與羅馬及一切外國組織割斷關係，加入愛國會，與教宗割離。

在五十年代，中國天主教徒的良心受到進退維谷的困擾，每個人都需要作出抉擇，非常痛苦，沒有人可以逃避。當時每個教友只能按自己的良心去處理這場衝突，天主教徒必須在愛國和忠於教宗兩者之間作出公開的選擇，而事實上，在他們的良心中，這兩者並不衝突，可以並存。

一部份天主教徒選擇絕對效忠教宗，接受叛國反動的罪名，結果給定罪，受侮辱，被鬥爭。他們暗地裏實踐宗教生活，其實他們不但在內心深處保持着一份對祖國的熱愛，並且藉監獄或勞改營中的勞動，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提供很實際的貢獻。與此同時，另一些天主教徒却選擇了加入愛國會，他們被其他天主教徒所輕蔑，被指為放棄天主教信仰者，成了官方教會機構的負責人；但他們中大部份人士仍在內心深處保持着對

教宗的忠誠，且以行動實現他們對教會的熱愛，在重重困難壓力下，承担着牧民的任務。

中國天主教會雖然面對各種困難衝突，仍然繼續是「一個」天主教會，甚至在愛國會成立以後亦是如此，可說是在同一教會內存在着兩種見證。雖然這兩種天主教徒的見證方式不同，但在一個教會團體內，仍同樣熱愛祖國，同樣忠於全球教會的首牧。為此，中國政府和普世教會都該為中國天主教信徒團體而感到自豪，以愛心對待他們。

雖然上述對中國天主教會的描寫，有時會因為中國教會內某些人性弱點而引起質疑，但無論如何，任何以偏概全的理論均有欠公允，且在探討中國問題的方法上亦欠正確。最低限度，我們應在整件事情得到澄清之前，給予他們適當的信任或悔改的權利。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應讓後人去作最後的判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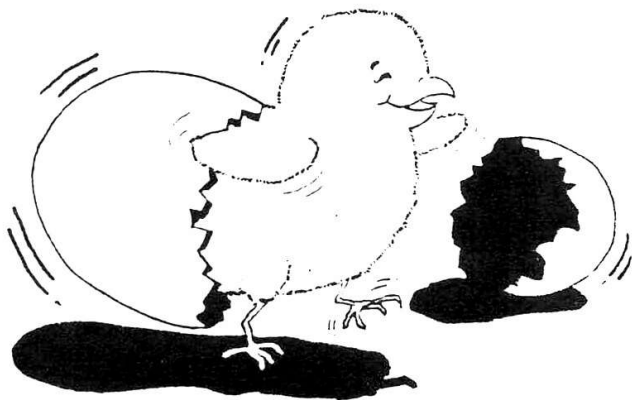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統戰政策和中國五大宗教的愛國組織都給紅衛兵粉碎得一乾二淨。而文化大革命亦把中國天主教會帶進歷史的第二個階段。

在左派份子積極剷除四舊（舊文化、舊習慣、舊風氣、舊思想）的時候，所謂地下教友組織和官方的教會機構均受到迫害。當時天主教會不僅是為了政治因素，還為了信仰而受迫害。無神共產主義左派所攻擊的明顯目標，就是宗教。可以說，當時整個中國天主教徒團體，都共同見證了十字架的奧蹟；中國天主教會實被巴斯卦奧蹟所淨化。

文化大革命持續了最低限度十年，當時的天主教會成了地下教會。在教會歷史中，這是一個漫長的嚴冬，種子埋藏地下，期待新春來臨。

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出掌政權，統戰部亦恢復活動。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一份文件（第十九號），題目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上的基本政策」。這份文件表達了黨對宗教的政策，它承認：宗教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如果在宗教問題上處理得當，這對於國家的安定團結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在文化大革命時代，左派力量曾經在宗教界製造了大量冤案；宗教信仰自由是現行宗教政策的核心；用簡單的強制方法去處理宗教問題是不當的；宗教自由政策的主要目標就是團結，要聯合信徒和非信徒一起去重建國家；必須保障八個宗教組織，但是黨員不得擔任這些宗教組織的工作；任何非法的宗教活動必須制裁；要堅決抵制外來宗教組織的滲透；要在平等和互不侵犯的原則及基礎上，與國外宗教組織進行友好來往。

結果，這種宗教解放政策，在中國天主教會內產生了兩種現象：其一，就是教會牧民活動的重整：新恢復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在一九八〇年五月至六月期間，舉行了第三次大會，接着在愛國會會議之後，中國天主教的代表舉行了三天會議，與會的二百名代表（並非全部屬於愛國會）成立了「中國主教團」和「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這兩



個新組織，均以處理天主教會內部事務為目標，主教團處理教義問題，教務委員會則照顧牧民事宜。這些新組織的成立，顯示了教會在結構上的重大改變。在五十年代，愛國會是中國天主教會內的唯一權威；但到了八十年代，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只保留了它起初的任務，就是作為中國政府和天主教會之間的橋樑。（註二）

中國教會復甦的第二個現象就是：愛國會天主教徒和非愛國會天主教徒雙方面的合作。許多埋在地下的種子，在陽光撫照下已經逐漸滋長茂盛，使一片蔥綠的原野呈現五色繽紛。在這漂亮的景色中，愛國會與非愛國會的界分已漸漸模糊，他們是生長在同一草原中的各種不同花草。我們為此而歡欣鼓舞，因為中國天主教會的春天亦同時是普世教會的春天！

## 神學含意和交談展望

在天主教愛國會外部組織功能的革新、和中國天主教徒個人內心態度的轉變後面，究竟隱藏了那些神學問題？為促進中國政府和天主教會進一步的交談，到底有什麼事情需要澄清？中國觀察家已經指出，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是衝突的標記，環繞着它的爭論持續至今。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存在在神學上產生了問題，但是，亦由於它往往是爭辯的記號，故真正的問題很難浮現。現在我們要問：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背後的真正神學問題是什麼？

我們可以指出兩類相關的神學問題：第一類問題牽涉到國家與教會、宗教與政治、精神與物質、信仰與正義、以及天主教與共

產主義之間的關係。這些問題來自中國的社會及文化的現況。第二類問題涉及：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之間的關係、全球主教「共同負責」與教宗的關係、教宗的普遍管轄權與梵蒂岡外交政策的關係、選舉及提名主教的問題、聖教法典與教友益處的關係、合一與多元化之間的關係等等。對於這一切問題，即使我們不考慮其正統性，最低限度也應該考慮這些問題的正確措施，因為在理論層面上，它們仍然有待澄清。

也許在這兩類問題後面所隱藏着的，是另一個更深的問題，就是地方教會的本位化問題。它的實現，不應只是在理論或觀念的層面上，更應實現在行動與結構方面（建立本地聖統和配合當地的處境），尤其是在培育本地人材方面。最後，對上述問題的神學反省，必須在更廣和更複雜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中來進行。

從歷史和神學的觀點看，想用一般西方剖析問題的方法去了解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真實意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國觀察家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看法，分為兩種不同的思想派別。第一派採取「傳統式反共觀點」，不肯承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認為愛國會已經放棄了基督徒的正統信仰，已變成只為現世政權服務。第二派採取「歷史與人文觀點」，強調問題的複雜性，不敢貿然批判，只嘗試了解問題的關鍵所在，亦同時由於愛國會過份與俗世政府認同而感到困惑。然而，這兩派人士均需要面對隱藏在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背後的真實問題，那就是要探討在意識型態上與西方迥異的中國如何處理政教關係。

從歷史與人文的觀點看，傳統式反共立場實在缺乏了歷史幅度，因為這種反共立場

顯得過份偏重靈修，忘記了教會亦須在現世負起社會正義的使命；此外，這種反共立場採取了西方的思想態度去處理中國的政教關係問題，顯得很不恰當。

西方歷史出現過多次政教衝突事件，在同一意識型態與社會制度下，政教雙方都亟欲爭取更大權力，而在這些鬥爭中，教會屢佔上風。至於在現代中國，共產政府和教會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意識型態和社會制度上，發生過衝突。所以，假如教會繼續採取反對政府的立場，便很難不淪為反動勢力，與其他國外反共勢力牽連在一起。中國教會亦因此會被剝奪一切政治上的任務，令到所有政治責任落入對政府採取不對立態度的愛國會手中。這樣，愛國會便成了教會和社會主義國家基本衝突的結果。因此，愛國會必須成為一個政治性組織，使教會不受政治干擾；愛國會亦因此充當着教會與政府之間的橋樑。

這種解釋還認為：在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期間，教會已經是反共產政府的團體，而且多少亦與反政府的人聯結在一起。在一九四九年，教會中大部份的領導權仍然握在外國傳教士手中，他們大都來自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而教會基本上是支持國民黨，許多神職人員和教友都隨着國民黨軍隊撤退到台灣，而在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主教被逐出中國之後，羅馬方面跟着派遣他到台灣，當時台灣和共產政府正處於戰爭狀態。

至於留在中國大陸的天主教徒，則各抱不同的心態。一方面，政府禁止任何反對國家重建的政治行動，另一方面，教會亦禁止教友與共產政府有任何政治活動上的合作。在這樣的環境下，天主教徒只有兩條路可走：其一，就是絕對不與共黨交談；其二，是

基本上接受中國，爲能作進一步交談，因此，有些教徒接受了愛國會這事實，把它視爲一個處理政治事務的組織，爲的是使整個中國教會能夠在傳教工作上完全擺脫政治。至於選聖新主教的問題，他們認爲向羅馬請求批准是政治上的事，因爲羅馬的政策很明顯是支持台灣。

根據愛國會的自我認識，愛國會的存在是依照傳統政教分離的原則。如果教會的存在只是爲了達成宗教使命和靈修方面的牧職，則愛國會便是一個保障政教分離、聖俗分離的政治組織；愛國的天主教徒不須接受無神主義，但是他們在俗世政治範圍上必須接受政府的政策。這種愛國立場比傳統反共立場更合邏輯，因爲後者採納了某種政治意識形態（就是國民黨），並在現存的社會體系中爭取政治權力，有損基督信仰的純正性。

愛國會的觀點是：中國教會必須脫離羅馬，獨立自主；只在俗世政治問題上，依附中國政府。愛國會對梵蒂岡政策的批評，以及拒絕梵蒂岡的控制，只涉及一些在特殊情況下與政治有關的問題。愛國會所採取的態度是：「神權歸於羅馬，俗權歸於中國政府。」它也選擇了「對中國產生歸屬感」的態度。愛國會的成員感到，在歷史的現階段是基於正義而選擇與人民認同。愛國會的成立實在蘊含着某種歷史的因素，因此，它所聲明的目標便得到「歷史和人文觀點」的神學家的同情。

照以上的探討，「傳統式反共觀點」和「歷史與人文觀點」均只是片面地剖析了愛國會的實況；他們的評價並不完整，因爲愛國會有它自己本身的存在和活動方式，外人無法加以界定。一方面，愛國會以傳統的政教分離基礎爲原則，不採納共產黨的無神主義，只接受共產政府在俗世事務上的政策。

這樣看來，愛國會比傳統的反共派較爲有意義，因爲後者不但使資產階級的反共政治意識型態變得絕對化，而且亦爲它撐腰。但另一方面，愛國會配合「歷史與人文觀點」，與現代中國的歷史動向認同，視自己爲對上主呼召教會投身社會正義的一項回應。但愛國會也令到這一派人士感到困惑，因爲在要求教徒與政府合作的同時，教會却不能以批判的態度去參與公衆生活。不過，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存在，却向教會的舊架構提出了挑戰，只有加入愛國會才能享有批判的功能，即是：促使政府遵守宗教自由的諾言，製造履行教會牧民工作的有利條件。

上述對愛國會的推理和分析頗爲有趣，但它的缺點却在於沒有劃清楚實踐、意識型態及理論三方面的區別。在這些不同的層面上，天主教徒或教會，必須尋找出與現存國家政治實況交談的途徑或批判性的合作方式。例如：天主教徒在拒絕共產主義內的無神論的同時，仍可以接受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中的某些觀點。無論如何，他們必須持有批判的態度去面對國家政策所包含的反道德行動和組織。雖然中國的教友在新中國的環境下，應當實現他們的歷史使命，但是這並不等於說，他們可以免除批判意識型態及批判社會制度的責任。在各種不同的意識型態和文化制度後面，存在着一些超越的文化，和每個人所享有的基本權利與責任。也許其中最重要的權利和責任就是：參與個人或社會各方面生活時，每個人都應時常保持忠誠、主動和批判的態度，同時亦應在思想行爲上追尋生活的超越幅度。被動式的合作，決不是達致社會改革的最有效途徑。

在有關愛國會的第一類問題中，最主要的就是宗教與政治的關係，以及教會與共產政府在實踐、意識型態及理論層面上的交談

和合作。至於第二類問題，最主要的顯然就是中國本地教會與普世教會、特別是與教宗的關係。教宗不但是羅馬主教和梵蒂岡教廷的元首，他也是普世教會的牧者，對全球教會和每一個地方教會都享有最高統轄權。至於行使這種主權的方式，是由教宗主動地行使？抑或在一些特殊情況下，被教會內任何一位教友推動去行使？仍是一個開放的問題，有待闡釋。例如：選立本地教會主教，可以有提名、選舉或事後批准等不同的方式。事實，教會歷史顯示了許多不同的方式選立主教，亦曾考慮到政府的權力。在這些問題上，我們要謹記聖教法典的最終原則：人靈的得救是最高法律。

連結上述兩類問題的基本問題，就是中國教會的本位化。一般而言，教會「本位化」是指新興的教會為自己選立本地主教及神職班。這一點是「神學本地化」的後果，而所謂神學本地化，則是指神學紮根於當地傳統文化、並以其思想方式表達出來。「本位化」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切合本地的處境」，也就是說，教會必需「降生」在某民族此時此地的歷史及社會處境中，並與整個民族一起邁向未來。當然，教會本位化是第一步，因為使教會在當地文化中植根的工作必須由本地人擔當。在中國，教會本位化已經開始實現，而且亦會在現在的特殊環境下繼續推行。不過，本地神學則尚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植根。

在過去三十五年間，中國教會在本位化進程方面不斷掙扎。她的基本任務就是吸收中國歷史及文化傳統中的積極要素，使自己活潑地植根在中國的歷史及社會情況中，以辯證方式去與中國人民認同，一起建設一個現代化的中國社會。現代神學家認為要用新的方法去從事神學，而這方法該是自下而上的，換言之，這新的神學要由草根階層的具

體環境而產生，是「屬於」窮人及「為」窮人而存在的神學；它不強調理論上的正統性，却強調爭取人類全面解放的實際行動。發展這樣的神學，就是今日與將來的中國教會所要承擔的任務。

##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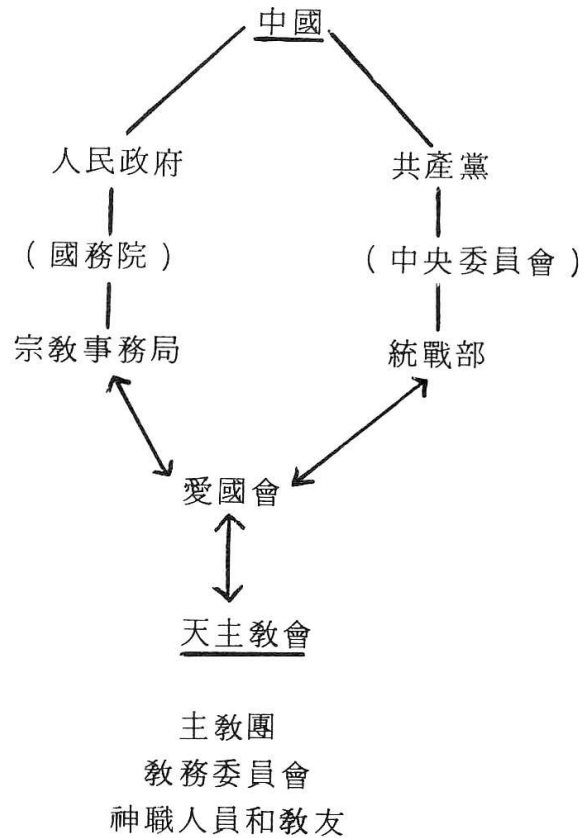
由於篇幅有限，上述的神學問題只能很概括地交代；它們實在是關心中國本地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同道們，所必須嚴肅地反省的目標。論到教會與本地文化的問題，往往會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就是「文化交流」問題，它關係到各個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地方教會之間的溝通。在與普世教會共融的基礎下，全世界、特別是亞洲的本地教會，都有責任去促進與中國教會的文化交流，以增進互相之間的了解、合作和建設。最近馬尼拉辛海綿樞機主教、香港的胡振中主教、以及一些亞洲主教團的成員，都訪問過中國，實現了初步的文化交流；這些訪問該當促進神學與牧民方面的共負責任。

最後，我們還要提及「超越區域的文化交流」問題。教友該致力推進全球性的合一，使人類超越個獨國家文化的區別，接受那種方興未艾的宇宙性文化的共同價值。超越個別文化的交流，將有助教會在明日世界的宇宙性文化中植根。那時，基督的教會和中國並肩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因為他們對人的命運共同承担着同一的展望，雙方都致力為全人類尋求超越文化和超越國度的合一。只有當中國和基督的教會在辯證的方式中去分享彼此的視野和力量、攜手並進時，人類歷史的新發展才能邁向頂峰，因為只有復活基督的宇宙性威能，才能把人類烏托邦的夢幻，轉化為歷史中實現的真希望。

附註：

(一)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是教會在政治事務上的分支，主要任務是作為教會與國家之間的橋樑。愛國會是一種群眾組織，在全國性、省級或市級愛國會均設有秘書及少量辦事人員，而其他愛國會成員資格却沒有硬性規定。

(二) 中國教會與國家關係的現行架構如下：天主教透過愛國會，一方面要向人民政府宗教事務局負責；另一方面也要向共產黨統戰部負責。這些關係可列表如右：



## 牧我中華

蘇主榮編

本書收集近代教宗所有關於中國的訓導。由該書可以看到我們天主教對無神主義中國在態度上的演進，由強硬而變成交談，既保持公教信仰的立場和原則，又不失開放修好之道。它是目前每個關心大陸教會的教友的必讀書籍。

聖神研究中心暨聖神修院校外課程部出版  
訂價港幣二十元正

港澳以外地區，連郵費：平郵美金\$3.50  
空郵美金\$5.00

